

洪仁玕、容闳与太平天国

——西方文明与近代中国农民起义

戴学稷 徐 如

太平天国起义是自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二千余年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最高峰。1853年奠都南京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①作为它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长时期延续贫困化的中国农村的最高追求，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广大农民最高理想的体现。然而它却同时带有小生产严重的落后性和空想，在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随着农民起义队伍进入城市 and 生活的相对安定，其内部的弱点逐步暴露，表现了这个阶级的局限，终于导致内讧而走向下坡路。

正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洪仁玕、容闳先后给这个农民政权带来的源自西方先进国家、企望用以挽救和改造中国的方案。

但是对于此时的太平天国来说，这些建议和方案也只能是个无法实现的“福音”，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洪仁玕和容闳各自带来的这些方案和建议，可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体现在其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和措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

次试探性接触，也是近代中国早期西方文明被中国人自己介绍进来的两次记录，然而它们都没有可能得到实施，只是“纸上谈兵”式地议论了一下，就被束之高阁了。其实际情况如何？它们有没有值得肯定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

洪仁玕（1822—1864），洪秀全的族弟，原先跟随洪秀全在故乡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通过私塾教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851年金田起义时他未能一起参加，也没能赶上起义军队队伍，以致自1853年到1858年流落在广东东莞、香港和上海等地。其间他曾在香港4年，游历过上海，与一些外国传教士多有交往。他在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同时“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熟悉各邦洋人情况习俗”^①他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美英等国的政治制度，探究它们富强的原因。1858年，他不辞艰险，自香港出发，于1859年4月辗转到达南京——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投奔洪秀全，大受欢迎，被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朝纲。

洪仁玕在受命主持朝政的1859年，即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在这篇施政纲领里，他一方面介绍国际形势，“略述各邦大势”，另方面根据他在香港和上海的观察所得，提出一个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纲领，其要点为：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事业；主张建设近代交通：制造火车、轮船和各种交通器械；提倡开矿山、兴水利、办银行、办保险、设邮局、立报馆；奖励私人发明，保护个人专利，准许民间投资等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②

^① 《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近代史资料》总92号（1997年9月），第83、77页。

^②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新镌），《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7—694页。

对于洪仁玕的这些建议，洪秀全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多数批以“此策是也”、“是”的意见。但以后却不见下文，没有看到对这些实施或试行的记载。这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里，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从洪仁玕 1859 年抵达天京，随即提出《资政新篇》，到 1864 年天京陷落，前后不过 5 年时间。而在这 5 年里，太平天国毕竟由于前此领导集团内讧、互相残杀和石达开率兵出走后元气大伤，已无法恢复到前期的盛况，虽在军事上有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的英勇奋战，取得许多胜利，但总的说来是处于被动的不利形势里。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建设方面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就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应当说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因为当时在江南一带已孕育有资本主义萌芽，随后不久 60—70 年代在上海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就自发地产生了民间的资本主义工业了。但是主要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洪仁玕的这个近代中国最早而且是较有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虽经天王洪秀全加以赞赏、批准颁行，也只能搁置起来，无法付诸实施。进行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虽然这时洪秀全已由原来的农业社会主义转向赞同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形势已不由他来作主了。洪仁玕对此实际情况自然是深为理解的。作为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和一同革命的同志，他忠于农民反封建运动，只有死心塌地与洪秀全生死共甘苦，坚持斗争到底了。他只有期望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后来实现他的这个理想了。

二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人，1847—1854 年在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个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学位的中国人。他出身于贫苦农家，在美国留学期

间，即关心中国形势的发展，同情太平天国革命，1855年回国后在广东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屠杀红兵起义群众和无辜人民的惨状，而“深恶满人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①同时，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教育影响，对美国式的文明极为崇拜，但他热爱祖国，一心期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也因此缘故，他于毕业后坚决回国。1860年11月初与两个外国传教士结伴，由上海前往天京访问，于11月中下旬到达目的地，受到干王洪仁玕的热诚欢迎，进行晤谈。容闳自称此行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②。他一路所见所闻，对太平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和军民关系都留下了良好印象。在与洪仁玕晤谈时，他提了七条建议，要点为：一、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六、为民众建立各级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七、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③。

以上7项建议内容涉及军事、教育、行政改革、经济金融等方面，重心则在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与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但远不如《资政新篇》全面和系统。洪仁玕对容闳提出的这7项建议是极为赞同和十分重视的，但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它又是不可能付诸实施。这个情况在一年多前在他提出《资政新篇》时已经亲身经历过，因而是深有体会的。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②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页。

^③ 《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第61、62页。

尽管如此，洪仁玕还是与容闳进行认真的“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并且婉转地告诉容闳，“他深知这些措施的必要性，但是任何一项措施，都必须经过多数人（指出征在外的诸王及领导人）同意以后，才能实行”^①。

容闳对于洪仁玕没有立即并全部接受他的建议大失所望。其实他这次的天京之行并非真心实意地要来投奔太平天国的，而只是进行一次好奇性的了解和试探而已。作为长期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已很难与农民融合为一体，尤其是发现太平天国的一些落后面后，更觉得格格不入。在进入太平天国占领区，特别是在天京逗留期间，可能已获得此行期望的答案，即太平天国是否有可能取代清朝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与态度显然是与洪仁玕不同的。

因此，容闳辞谢了洪仁玕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退掉了洪仁玕赠他的“义”字爵位，离开天京。洪仁玕也不勉强他，答应他的请求，很快地便发给他通行证，并给他备足了返程的食用以及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送他们一行乘原船出太平军占领区回到上海。

三

洪仁玕和容闳都出生于我国南方广东省沿海的农民家庭，又都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尽管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接触及所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程度和时间有深浅、长短的区别，但他们都企望把他们从西方发达国家所寻求到的拯救和振兴中国的方案，用以改造和变换贫穷落后祖国的面貌，试图借助于正在兴起

^① 容闳著，王蘅译：《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页。

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和理想。

洪仁玕于 1859 年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炼后从香港辗转到达南京时，正值太平天国内讫后元气大伤、朝政乏人主持的忧患岁月。这个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又学识渊博的人才，正好是洪秀全所迫切需求的，因而他大喜过望，即封洪仁玕为干天福，旋升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不满一个月，即正式册封为干王，任命为开朝精忠军师，总理朝纲。这正是当年东王杨秀清所拥有的权位。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建都南京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它当时的最高信条。然而，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即洪仁玕到南京前这几年的实践，《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生产、分配等原则和他们所崇尚的理想，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洪仁玕到天京后向洪秀全呈献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深得洪秀全赞赏，洪秀全对其中的大部分条款都表同意，批准付诸实施。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到支持《资政新篇》，对洪秀全和他主持的农民政权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可说是一种飞跃。遗憾的是当时的环境和形势，不允许它得到实现。

容闳与洪仁玕的经历不同，他尽管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也希望它能成功。但他 1860 年赴天京的目的，正如他出发时所表明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清王朝”。到他抵达南京后经过仔细观察和慎重思考后，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在为了中国利益而推行教育计划或革新政治方面，还是在进取方面，都没有使我感到任何希望”^①，也就是说他不仅因洪仁玕没有当即接受他的七条建议而失望，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太平天国并不可能取代清朝政府，因而他推行教育救国的计划无从实现而感到绝望。结果也只能是败兴而归。这也就是他虽受

^①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70 页。

到洪仁玕热情接待，并诚恳希望他留下来共同为太平天国事业效力却断然拒绝的根本原因。

其实，容闳所提的七项建议虽涉及多方面，但重心还在于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上，与以后他通过曾国藩向清政府建议派遣少年学生留美计划，内容实质是基本一致的。他以教育救国、在中国实现美国式的西方文明作为自己的宗旨。他的这一套主张在当时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境内确实是无法实现的。以后在清政府大办洋务的时机里获得支持，基本上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成为倡议派遣并办理官费出国留学的第一人，被尊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并在中美文化交流上作出许多贡献。

总而言之，不管是洪仁玕 1859 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或者是容闳 1860 年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项建议，其本身都是他们要求按西方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改造和振兴中国的救国方案。对于当时的中国说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而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限于当时的环境和局势，太平天国无法在其占领区实现任何资本主义改革，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不可能在战争条件下获得实现，然而洪仁玕和容闳改造中国的方案并不因此而丧失它们作为中国近代化勇于尝试的重要价值。洪仁玕和容闳都是我国最早敢于去吃螃蟹的人，是为谋求中国近代化而提出草图的可敬先驱者。